

对于一组信件的阅读札记

□张元珂

1936年7月大光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论》第一卷,收录了一组贺玉波和芳君两人围绕“叶绍钧童话”进行交流的信件。贺玉波是上个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对叶氏童话创作比较熟悉,曾在《读书月刊》上发表过相关采访文章;芳君是叶氏童话的一个普通读者,同时也是叶氏童话的忠实“粉丝”。贺玉波与芳君互不认识。芳偶尔读到贺的这篇采访文章,遂产生共鸣,于是给他写信,围绕叶氏童话和当时中国文坛童话创作现状,提出了很多问题,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此后,两人书信往来,平等交流,共同探讨,以书信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双方在信中所展露出的探讨问题的真诚态度,让我对他们的批评风格、交流方式和所处时代的批评环境羡慕不已。

这组信件所探讨的话题,是我见到的最早对叶氏童话的创作思想、艺术特点、缺陷不足和相关儿童文学理论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与讨论的文章。在此之前,《〈稻草人〉序》(郑振铎)、《〈古代英雄的石像〉读后感》(丰子恺)、《表·译者的话》(鲁迅)等文章只是就其单篇作品进行评论或者在论述相关话题时偶尔提及;在此之后,《试论叶圣陶的童话创作》(蒋风)、《叶圣陶童话创作的思想轨迹及其艺术特色》(金梅)等文章和一系列相关的文学史著所形成的系统性的观点,基本上是对这组信件内容的直接改写或横向移植,所以,这组交流信件所取得的探讨成果,为此后文学批评界对叶氏童话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在信中,贺玉波将叶氏童话的特点归为八条:具有正确而统一的思想;含有哲学的色彩;对于现实社会的组织有精密的分析;充满灰色的成人的悲哀;题材和故事富有趣味;喜用象征的写法;含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技巧成熟。这个判定对叶氏童话作品中的思想特征、艺术形式、哲学内涵、审美风格作了一个综合性的评定,其归纳的深刻性、系统性代表了那个年代读者的最高接受水平。他说,在结构方面,作者是极力模仿西洋童话的,并以《一粒种子》《跛乞丐》为例加以分析、确证;在题材方面,指出他喜欢用科学现象作为童话的题材,并和吉卜林(Rudyard Kiplin)的作品作比较;在接下来的几封信中,他对两本童话集《稻草人》和《古代英雄的石像》中的作品,以和朋友谈话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文本解读,既从作家的思想状态、时代氛围、文坛动态等外部现象系统地探讨叶氏童话的创作特点,又从结构、素材、主题、角色设定等方面,深入文本内部,进行极为精细的研究。最后的结论是:“叶绍钧的童话,并不是普通一般的童话,他们像篇小说一样,对于社会现象有个精细的分析;虽然还保有着童话的形式,却具有小说的内容,它们是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的一种文学作品,而且带有浓烈的灰色的成人的悲哀。所以,我们与它把它们当做童话读,倒不如把它们当做小说读为好。”在我看来,这个结论实在是不同凡响,所提及的“成人思维”、“灰色的悲哀”、“介于童话和小说之间”,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单纯文艺批评的范畴,而上升到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高度。当代儿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众多文学批评中最薄弱的环节,理论与研究与儿童文学的创作严重滞后,这种从具体文本出发,发现、验证、总结文学批评理论的思路,或许具有某种启发性。

叶圣陶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早期奠基人。在当时,极少有人涉足该领域,叶氏凭着深厚的汉语功底、纯洁的童心和新颖的想象,吸收西方儿童文学的艺术经验,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为中国儿童文学开辟了新天地。早期,他的作品也深受安徒生、爱罗先珂、王尔德等西方儿童作家的影响,但叶氏的“拿来主义”仅仅是用来创造中国童话的形式工具,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轻车熟路”,虽然也走了很多的弯路,但终于修成正果。“十年来,叶绍钧的《稻草人》是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的创作道路的”,鲁迅这个中肯的评论很能说明叶氏对中国儿童文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探索与实践,对中国式想象方式的开拓,对优美意境的营造和童话角色的设定,以小说家的写作方式对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的尝试,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所塑造的“稻草人”、“石像”、“画眉鸟”、“小白船”、“含羞草”等文学形象,最早打破了“灰姑娘”、“天鹅”、“睡美人”等外国儿童文学形象在中国儿童文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的贡献。

叶圣陶本人就是从事汉语教学的“在场者”,推进汉语发展的“亲历者”,同时也是从事新文学(白话文)创作的“奠基人”。因此,其语言的凝炼、传神、纯洁,除未自清、冰心等少数作家之外,无人能比。以如此纯粹的民族语言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这就决定了叶氏童话从进入“文学现场”的那一天起,就具备了适合儿童、成人阅读的召唤结构和语言意识。两位读者不仅察觉到了叶氏儿童文学的经典气质,读出了经典内涵,而且还较早地涉及、探讨了“成人思维能不能介入”、“能不能表达灰色情感”、“小说艺术与儿童文学文体差异”等理论上问题,站在今天的阅读立场上,我不得不佩服这两位读者敏锐的审美眼光和超越性的文学史意识。两位素不相识者以“文”相识,以“文”相交,又以“文”实质性地将具体的童话文学作品与作家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探讨的深刻性、全面性以及文人之间交往的真诚性、典范性也是一段批评家与作家、批评家与普通读者、作家与普通读者之间默契交流的文学佳话。如今,叶圣陶的童话毫无悬念地被写进了各种版本的文学史,《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已经被当做儿童文学的经典篇目写进了语文教科书,这个事例再次说明:文学作品的意义,是作者赋予的意义和读者赋予的意义的总和;读者是文学活动的能动主体,也是一种文学史的创造力量,一部文学史应该是,不,必须是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是文学接受的效果史。

大凡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应该都知道叶圣陶,但真正了解叶圣陶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恐怕不是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叶圣陶是我国20世纪的教育大家,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70余年,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任教,虽然长期从事语文教育,却对教育问题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思想和看法,他所提出的许多教育命题,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科学并且有效,在今天看来,也很有价值与意义。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第一特点是革命性。叶圣陶生活的年代,旧的社会秩序刚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刚刚建立起来,加上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典型的农业国,产业经济还很不发达,因此,旧教育的“习气”还相当重。“叶圣陶在《革除传统的教育精神》一文中,把这种“习气”叫做“传统教育精神”,他说:“传统教育精神到了民国时代依然保持着。”这种传统教育精神就是以知识为本,学生上学就叫读书,教师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强迫儿童克制自己,做一个“邯郸学步”、规行矩步的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考试,至于这个知识学生是否需要,是否有兴趣,老师全然不顾。老师把学生当做没有生命的空袋子或空瓶,只知道往里面装知识。因为这样的教育的好处是:老师省心省力,不需要劳神费时去认真备课,只管照着教学参考资料,将知识和答案往学生头脑中灌下去,不管学生是否理解,也不管学生是否有用。老师对学生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听话,听话的就是好学生,不听话的就是问题学生,其聪明才智与创造性再好,也不给机会,也是受打击和排斥的对象。这种教育,学校千篇一律,学生缺乏个性,更无创新精神可言。这种教育,学生虽能学到部分知识,但这些知识并不是生活需要的,所以许多学生把学校教育看成是一种负担,一点也没有从受教育上获得幸福感。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实用性。叶圣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教育家,而



是有着十分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大多来自个人教育活动中所见、所闻、所思、所得,特别是他对语文教育的许多论述,基本上是他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的经验总结。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没有套话、空话、假话,也没有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比如,他在《中学国文学习法》一文中谈国文教学,既谈到了国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是阅读能力训练与写作能力训练,又运用具体的例子详细谈如何阅读、如何写作,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又如,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中,认为“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打定小学生一辈子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根基。”而造成当时小学教育枯燥无味、像座古庙,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没有趣味的根本原因,是教师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假如教师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又如何去引导学生的人生呢?他说:“凡是自己没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人,对于他人的情性和希望,也是模模糊糊,弄不明白”。“自己的方向还没有定,却要引导他人;自己从事的事业的价值还没有理解,却要做这项事业,陶冶他人,这是可能的吗?”小学教育没有好成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教师欠修养功夫。由于教师缺乏修养功夫,对小学教育便没有自己明确的主张,只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学生要么是使用高压政策,让他们屈服,要么是放任不管,任其自由发展;在教学方面只让学生听讲、记忆、背诵,不管学生是否理解,也不管知识是否实用,既浪费学生许多精神,占了学生许多时间,也使学生会学了“盲从”,将来处理人事事务就只好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主意。而教师要获得真实明确的人生观和提高修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能等旁人来“觉我”,要靠自己觉悟,只有自己觉悟得来的,才能灵心彻悟,即知即行。叶圣陶这些思想和观点,来自于他长期对现实教育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解决教育低效甚至无效的剂良方。

叶圣陶认为,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因此,教育必须以生活为本。假如教育不以生活为本,其结果是:读了植物学可以不解薏麦,读了生理卫生可以绝无卫生习惯。学非所用,学用分离,是知识为本教育的写照。假如教育以生活为本,就能随时学习,随时应用,把知识变成生活的工具,为我们做事、为人、想心思、辨事理等日常生活服务,促使我们一天天进步和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就会一天比一天美好。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科学性。教育活动是有其自己的规律存在的。这个规律是什么,实际上早在几千年前的孔子和亚里斯多德等教育家就开始探索了,而把科学性带进教育学的教育家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教育学家赫尔巴特,他在建构教育学理论的时候,把心理学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自赫尔巴特建立科学教育学以后,人们对有教育有效性的探索就几乎没有间断过。叶圣陶在探索教育有效性的过程中,始终运用教育科学的思想。他在《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一文中认为:“凡是合乎儿童天性的,他们就愿意知道它,学习它;与他们的天性不相侔合的,

集编辑、出版、教育诸“家”于一身的叶圣陶,一生遍栽桃李,为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才学俊彦,众所周知者如巴金、如丁玲。此外还有些鲜为人知者,如姚雪垠等。姚氏虽然没有直接被叶老发现与提携的幸运,却有幸在小小年纪时就吮吸到了叶老文学作品中的精神营养,从而在文坛上迅速成长起来。雨露之泽,姚雪垠终身不忘,64岁时曾作七律一首《奉寄叶老圣陶》,表达感激与敬仰之情。诗曰:

拄杖青山意态闲,似听绿叶隐鸣蝉。
须眉已满昆仑雪,笔墨曾笼玉垒烟。
朴素文章秋水净,清新词句露珠圆。
至今后学头亦白,难忘瑶华唯雅年。

这首诗写于1974年7月2日夜。诗前有小序云:“昨接叶老寄来去年夏游香山照片,喜成七律一首奉寄。”“瑶华”,珍贵诗文。姚雪垠自注:“第四句指叶老抗战期间住在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姚雪垠诗词》)“第六句指五十年前未自清先生为叶老第一个短篇集《隔膜》写的序言所引的一首叶老早年的诗,至今记忆犹新。”(《姚雪垠诗抄》)“最后一联最能说出我的感情。我在少年时代读叶老的小说,至今已将半个世纪。”(《姚雪垠诗词》)1974年7月10日,他又在致茅盾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我读他的第一个短篇集《隔膜》,方在少年,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有些印象,仍然新鲜。”

《隔膜》,叶圣陶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顾颉刚作序。“集里固然有几篇——如《一生》《一个朋友》《隔膜》——是从骨子里看出人与人之冥漠无情的,但《母》《伊和他》《小病》《低能儿》诸篇,把人类心情的相通相感之境写得美极了……”(顾颉刚语)姚雪垠所说“仍然新鲜”的“有些印象”,是指顾颉刚在序言中引用的叶圣陶早期诗作《游拙政园》:“纤雨值休辰,园游恣幽赏。迴沼抱南轩,几窗爱净朗……”辞终各无言,看水倚轩幌。初荷碧玉盘,水珠滚三两。”只是历经50年消磨后的记忆发生错位角度,让把他顾颉刚说成了朱自清。

按姚雪垠自注所言推算,他读《隔膜》,应在1923年。其时他正在邓县鸿文高等小学读书,同学多是20岁左右的青年。这些“大学生”一面读小学,一面混绅士,交朋友,包揽词讼。其中还很有一些人抽大烟,嫖妓女,甚至专门勾引良家妇女嫖娼卖淫。学校里称兄道弟拜拜之风盛行,姚雪垠也常被硬拉去烧香磕头换“金兰谱”。面对如此无聊又无耐的生活,惟一的解脱只有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他从一个遭大兵洗劫的读书人家得到了一批装进麻袋即将用来垫猪圈的新文学书籍,《隔膜》应该就在其中。如同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忽然被打开了一扇窗,一阵清风扑面而来——《隔膜》中那无人理解无可诉说的苦恼与迷茫让姚雪垠感同身受,而那些美好的人类情感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与光明。他由此与文学结缘,并自谓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的“私淑弟子”。而叶圣陶对姚雪垠的为师之恩,不只在把他领进了文学之门,更重要的在于支持、鼓励他写出了中年时期的代表作《长夜》。

《长夜》是姚雪垠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1924年冬天他被土匪掳去,因被土匪小头目看中认作干儿子而保全了性命,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约一百天的经历。那是一段奇特的生活,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社会问题的奇特故事。姚雪垠亲眼看着一支土匪队伍如何由小到大,又如何被消灭。此后多少年里,姚雪垠无数次带着惘然的心情,像谈一段历险记似的谈起这个故事。朋友们常常被他的故事吸引,对其中的人物发生兴趣。每一次谈罢,总有人怂恿他把它写出来,姚雪垠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20多年后在成都遇到叶圣陶,再一次受到“写出来”的鼓励……书稿付梓时,姚雪垠特意写了《〈长夜〉后记》追叙了事情经过:“前年暑假,我到成都,暂时住在东方书社。一天晚上,东方请客。席散后,叶圣陶先生,董每戡兄,东方的王毓萝经理,和我在院中吃茶,随便聊天。不知怎样引起的,我把这故事又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当时叶圣陶先生曾劝我把它写出,王经理也很打气。从那天晚上起,我才有写的决心。若没有这次闲谈,也许这故事会永远放在心里,等将来埋在土里,永远也写不出来。”

1947年,《长夜》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的“姚雪垠”辞条中,主笔严家炎先生这样介绍它:“《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永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生活,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从《隔膜》到《长夜》,文坛上一代薪火传承。前辈的心血与汗水,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作为一个“后学”者,姚雪垠对此铭记不忘。他说:“我是在‘五四’文学先驱者们的启发和教育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没有他们那一代,也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他满怀感激致信茅盾:“近些年来,对于尚健在的‘五四’前辈和同辈,常充满怀念之情。倘若没有‘五四’前辈的辛勤努力,则新文学不容易站稳脚跟,而我们后起者也将无师承。这一简单道理我到中年以后,才逐渐理解深刻。前几页写给叶老一首诗,也是表露了我的这种心情。”他一腔真情告诉叶老:“历史永远是前后继承的,不管后来有多少发展,必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借群策群力推动起来,并缔造了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有贡献的前辈们,后来者是不会忘记的。”

他们就不想知道,不高兴学。”“教师教各种科目,教各种教科书,并不是教过了就完事了,还要以教育的价值为出发点,适应学生的天性,拣那学生需要的给他们指导。”这些论述可谓言简意赅,一石中的。他在《小学教育的改造》一文指出,要使儿童经常有求知识的动机,须要根据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想办法来引导他们的本能,顺应他们的欲望,扩充他们的兴趣。“其实本能是教育的原料”,“教师如果能留心儿童的本能,便可以在教育上找到扼要的手段,随时获得新的经验和知识。”“欲望是人生活动的原动力”,“顺着他们的欲望的趋向,作为教育的人手方法,使他们如愿以偿,才是教育者应当尽力的事务。顺着他们的欲望,并不是使使他们纵欲肆志,而是不加摧残,并不违拗,引导他们满足欲望,归结到合理而有系统的道路上去。”“兴趣是我们生命所寄托”,“今后的教育要着力于扩充儿童兴趣所及的范围,并使他们养成终身的学习习惯。”“教育者须要扩充自己的兴趣范围,更须要真切了解儿童的兴趣可能及到的范围。”教育与栽树不同,因为树木是没有动机、兴趣、欲望的,教育的科学性就在于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心理,作为教育工作者,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引导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工作取得良好的效果。

叶圣陶教育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生成性。了解叶圣陶的人都知道他的著名教育论断: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认为“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一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不需要教了吗?”“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要做到少指点,少讲说,就必须转变教学方式,改变“学生天天听讲、年年听讲,某字什么意义、某句怎么

□许建辉

从《隔膜》到《长夜》

□周可桢